
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下的日本战略研究

卢 昊*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正处于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引，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根本途径。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着崭新的发展局面。

在时代趋势及国家发展推动下，构建中国自主、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及学科体系，以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尤其是对外交往中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从 2022 年起，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独立一级学科，区域国别研究自此进入现代化学科建设和制度化保障的新阶段。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旨在从国家的现实与长远需求出发，科学把握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为我们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促进自身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念与政策支撑。2025 年 4 月，中央召开周边工作会议，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① 加强周边工作、创造有利周边环境、以周边为基础运筹全球外交的前提是开展更为科学、系统且扎实的周边研究，这与推动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构建发展区域国别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强烈共鸣与相互促动。

基于上述背景，兼具国际问题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周边研究属性的日本研究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在如何进一步构建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及

* 卢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

①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网，2025 年 4 月 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_674881/202504/t20250409_11590690.shtml [2025 - 05 - 01]。

话语体系方面,也面临着更多课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问题日益超越单一国别、单一领域范畴,这也反映在区域国别研究日益凸显的综合性、跨学科与多学科性。中国的日本研究需要构建起基于深厚传承、又富于创新发展的研究路径,有必要打破传统学科划分界限,以更明确的问题意识,抓住主要矛盾,拓展交叉思维,融合基础与应用学科,开展综合性、战略性研究。

一、区域国别研究与日本战略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是多学科、跨学科、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领域。正如学科专家们指出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依靠多个学科参与,共同聚焦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相互配合、彼此融合,形成任何一个单独学科都无法形成的知识谱系。简言之,在明确的地域研究对象前提下,开展跨学科、多学科研究。^①具体到国别研究,它既包括分科研究,即分门别类地研究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每一方面又可分为更细的专门研究;也包括综合研究,即对于国别的整体研究和某个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其中,前者的专门研究难以脱离对象的综合背景而孤立展开,后者更是具有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特征。国别研究的基础是国情研究,也就是要从历史到现实,把对象国国情的各个方面搞清楚,特别是现实的发展,需要进行实地体验和调查。^②同时,以这些方面的问题研究为基础,区域国别研究还要以政策性、战略性、综合性研究为指向,系统探究区域国别发展中的基础性、关键性因素及其规律作用,深度揭示影响区域国别现实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趋势,从而为国家制定宏观政策、应对复杂紧迫的国际问题提供学术支持。^③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整体把握、问题导向、专业基础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这意味着,研究者要以一些对某个特定地区或者国家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相关性问题为枢纽,联结各方面的专业研究成果,从而获得对该地区或者国家的一种整

① 钱乘旦:《深入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求是》2025年第8期,第37—40页。

② 张蕴岭:《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6月21日, https://cssn.cn/zkzg/202406/t20240621_5760489.shtml [2025-05-01]。

③ 翟崑:《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网,2023年11月8日, <https://www.igcu.pku.edu.cn/info/2313/3794.htm> [2025-05-01]。

体性把握；至于那些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研究者应选取特定的关键性因素或者侧面，运用专业的研究方法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握。^①这也是国别研究体系下综合战略研究的出发点。

无论日本还是中日关系，都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当代中国日本研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已具备了深厚的积淀与丰富的成果，同时肩负着继往开来、持续创新的使命。如中国日本学界同仁们指出的，进入 21 世纪，与经济长期低迷、政局动荡多变的日本相对照，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作为日本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中国和日本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引起的刺激与反应，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的视角、方法以及问题关切产生了重要影响。强化研究者主体意识，构建中国特色的日本研究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依然是中国日本学界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②为此，要进一步梳理中国日本研究的传统，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优势和特色。同时，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日本研究也面临国际化的要求。这种国际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要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日本研究学者进行交流，在学术探讨中互相启发、共同提高；另一层面则是要将日本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国际战略背景，将其放在东亚、亚洲乃至世界范围来思考，打破简单的区域研究隔阂、学科分野隔阂，不断壮大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力量。^③另一方面，近现代日本及中日关系的演变并非孤立的，而是始终具备重要的区域乃至国际战略背景。而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其战略自主性持续走强，使得日本战略因素对中日关系产生越发直接、明显的规定性作用。在此背景下，综合性战略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更趋凸显。这里的“战略”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战略，而是基于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战略视角，贯通运用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范式、方法，从体系层次（国际及地区格局秩序）、国家层次（国家战略及政策）、个体层次（国内政治主体、社会舆论等），对对象国家的国家大战略（包括总体战略及

① 唐士其：《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国高等教育》2025 年第 7 期，第 130—160 页。

② 《学者探讨中国日本研究的历史与未来》，人民网，2016 年 11 月 22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6/1122/c1002-28886311.html> [2025-05-01]。

③ 初晓波、李尧星：《初晓波教授访谈——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国际政治研究》，2020 年第 2 期。

重点领域战略)及其在国际战略环境中的具体行动开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始终以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重要使命,致力于日本研究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力图突破原有界限,同步推动线性、横向与纵向三个维度的拓展。实现学科融合创新,即依托基础理论研究和政策应用研究的融合、个人研究与团队合作的融合以及思想境界与知识领域的融合,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新效应。为此,2015年,日本研究所成立综合战略研究部,作为非实体部门对内协调各处室研究,对外承接对策交办任务;2016年,经过充分论证,又正式策划并申报成立综合战略研究室,2019年获得社科院批准。2020年,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日本研究所首个不以“日本”冠名的研究室,是推进学科体系建设、促进研究融创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日本研究体系下的新兴交叉学科。日本研究体系下的综合战略学科,聚焦现当代国际战略背景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强调三个基本研究视角,即从国际战略视角研究日本在现当代国际秩序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战略动向及规律,从国家大战略视角研究日本现当代国家总体战略及重点战略领域的动向及规律,从主体战略互动视角研究现当代中日两国战略博弈动向及规律,并据此为中国对外战略下的对日方略制定提供思路。综合战略研究室成立后,结合日本研究所总体科研布局与本室人员专业方向,在向传统优势及重点学科(研究室)借鉴取经的同时,积极摸索学科创新并开展有组织科研,在总体把握近现代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前提下,进一步聚焦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战略、地缘与海洋战略、经济及对外援助战略、国际传播战略等具体领域,抓住根本性、战略性、涉我关键性问题,不断完善学科体系建构,提高理论方法水平,形成研究良性循环,建设特色分支学科。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学科成立至今,在所领导的部署与指导及其他各学科部门的关心与支持下,发挥学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在学科体系建设、科研项目推进、研究成果产出、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也以自身努力为日本研究体系下的跨学科融创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二、研究核心议题:战后日本国家战略

日本研究体系下的战略研究,需要在综合性视角下抓住主要矛盾与根本问题,从研究对象即日本战略行为的各种表象出发,深入挖掘其中的底层

逻辑与固有规律。为此，关于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战后日本国家战略发展历程及其特点、规律的研究尤为重要，它不仅为本学科的前两个基本视角即国际战略及国家大战略视角下审视日本的变化及行动直接提供总体框架，也为第三个视角即主体战略互动视角下审视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变化、确立中国对日政策或具体策略提供必要前提。

战后至今，日本国家战略轨迹及影响该轨迹的内外因素几经变化。冷战结束后，日本为应对形势变化，加速谋求战略转型，展现出更强的战略自主性及综合战略活跃度。在此过程中，日本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确立战略目标进而设计推动政策手段，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塑造日本战略变化及具体选择，其战略行为遵循哪些逻辑，又反映哪些现实规律乃至心理文化层面因素，均是兼具理论及现实价值的议题。当前，立足战后 80 周年历史节点，以深化对象国别研究为目的，推动战后日本国家战略及重要领域战略动向研究时，应至少把握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日本具有明确且坚定的国家战略主体性。正如杰拉德·柯蒂斯、理查德·萨缪尔斯等所指出的，日本近现代化的进程贯穿了日本国家政治意识与战略思维的觉醒与发展。在战后，分析家们往往高估了日本对盟主美国的服从与追随，而低估了日本战略选择的主体性，以及贯穿其中的强烈的实用主义。^① 战后基于“和平宪法”及相关社会思潮的影响，日本无法高调地谈论战略问题，但“吉田路线”本质上就是日本为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而制定的国家战略。而且，国内精英阶层的战略讨论始终都在进行，并为后冷战时期的国家战略转型创造了思想及舆论前提。在冷战时期，随着日本经济及国际地位的复苏及崛起，批判“吉田路线”的“商人式国际政治观”，要求日本克服局限，以积极的对外政策面对全球化趋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力量，逐步成为日本战略界乃至决策层的主导观点。^②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在和平主义者日益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围绕国家战略路线，“普通国家论者”、“新自主论者”及“支持中等国家定位的国际主义者”展开了争论，并逐步形成同时加强日美同盟和自主防卫力量、在中美之间实施某种“双重对冲”的基本共识。“普通国家论者”的观点正在事实上主导日本的大

① 参见：Gerald Curtis, *Policymaking in Japan: Defining the Role of Politicia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Richard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MIT Press, 2007。

② 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論社、1969 年、174 頁。

战略。^① 日本的国家战略从冷战时期的经济中心导向转向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化目标导向，绝非短期的“基因突变”，也并非日本“反应式”地适应现实的被动行为，而是基于明确战略意识及长期战略思考的主动选择。日本关于何为既符合现实、又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战略道路的思考与谋划从未停止。在日本决策者，比如经历贯穿战后时代、冷战时曾积极倡导“自主防卫论”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看来，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当坚持追求独立、安全的价值目标，以及“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这是日本始终未曾放弃的努力。^②

日本的国家战略主体性，除反映于持续的、难以被外部约束所压抑的战略争论与摸索，也充分体现在对于“战略自主”的坚定追求。正如萨缪尔斯等人指出的，在日本的战略文化中，对于独立及威望两种价值的追求是持续性的，而且以经济手段是无法满足上述追求的。^③ 战后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接受“和平宪法”及与美国同盟的“双重规制”，但同时也在逐步积蓄力量，最终公开寻求摆脱“战后体制”，在内政外交乃至总体战略上“复权”乃至“扩权”，并力争维持“一流国家”国际地位。这迎合了冷战中后期日本“经济能量政治化”推动其战略诉求升级及冷战结束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国内悲情民族主义上升、战略危机感加剧的心理态势，也是日本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研判的变化所致。特别是在这一时期，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变化，美国对于日本战略重要性的上升及美国战略承诺可靠性的下降，成为主导日本战略思维、驱动其加紧谋求“战略自主”的两个关键判断。日本更加强调在日美同盟“体制内发展”前提下，加强自主战略能力的建设，并进一步发展“国际连带性”，推动多边盟伴路线以拓展战略选择。在追随服从美国的同时，日本亦从未放弃以自身价值与战略判断为依据开展行动，与美国加强战略绑定的同时，谋求在同盟体制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并努力争取同盟资产为己所用，乃至谋求“预判美国之预判”，主动引导美国行动，以期借同盟目标实现自身目的，试图将“日美同盟中的日本战略”转化为“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

① 参见：Richard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p. 117 - 131；于铁军：《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日本学刊》2023 年第 4 期，第 1—39 页。

② 中曾根康弘『二十一世紀日本の国家戦略』、PHP 研究所、2000 年、37 頁。

③ Richard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 21.

盟”。^① 在美国支持日本“根本性强化防卫力”、承担更多同盟权责的情况下，日本不仅在安全领域积极突破禁区，国际战略的主动性与外向性亦显著增强。而近年来大国博弈强化、逆全球化趋势及军事冲突的频繁化，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的实力主义、安全自助与国际博弈意识。日本对形势的认知更为现实，追求“战略自主”目标的意志更趋坚定，更加强调“抓住现在的机会去做（日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②

第二，安全议题是驱动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核心动能。国家安全是一国战略的核心，而战后日本重振安全防务乃至推动“强军工程”的意图并不止于维护日本安全，而是承载了更多驱动国家总体战略的目标及功能。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进程中的一条重要主线是恢复“安全主权”，乃至进一步发展与大国身份相符的安全战略能力及行动权限，而这最终成为日本大国化目标导向战略的基本构件。战后至今日本对国家战略的探讨，基本上是围绕着日美同盟及自身军事力量发展两大议题而展开的。在此背景下，日本思考国家总体战略的视角和逻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要素在内的综合视角，转变为强调外交、同盟政策特别是防务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及国际权威的获取。^③ 战后一度主导日本发展的经济逻辑逐步让位于政治逻辑，全战略领域的安全要素比重逐步提升。当然，首当其冲的还是军事防务建设的全面加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日本国家战略取得的实质性、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突破集中在传统安全领域，其安全战略主动性及先制性显著增强。具有代表性的举措包括：2015 年日本出台“新安保法”，其中定义的“武力攻击事态”“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周边事态”等赋权日本在不同情况下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大幅扩展了日本军事行动的范围权限；2022 年岸田文雄政府的新“安保三文件”进一步修订了安倍政府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允许发展先发制人攻击敌方基地、以中远程导弹为核心构成要素的“反击能力”；日本还积极放宽对武器装备出口的限制，乃至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及与别国联合开发武器装备。同时，在日美加强“同盟现代化”的背景下，日本在同盟体系中正从专守防卫的“盾”角色

① 杨伯江：《战后 70 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日本学刊》2015 年第 5 期，第 12—27 页。

② Richard Samuels and Corey Wallace, “Japan’s Pivot in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Iss. 4, July 1, 2018.

③ 杨伯江：《战后 70 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日本学刊》2015 年第 5 期，第 12—27 页。

逐步转向主动进攻的“矛”角色。^①

在日本的战略逻辑中,军事防务领域的突破是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指标”,也是日本维持国际战略地位的“实力后盾”。同时,在泛安全化战略思路下,日本外交战略、地缘战略的军事属性被显著强化。特别是日本利用“自由开放的印太”增进“国际连带性”,将其与协助美国强化亚太盟伴体系、促其“由辐辏向网络”转型的构想结合,并着力强化自身在其中的枢纽角色,从而推动自主化、安全化与“印太化”形成战略共振效应。日本在“印太战略”(FOIP)框架内积极布局强化“美日+”等“迷你多边”,包括作为 FOIP 核心架构的美日澳印四边,支持该框架的美日澳、美日印、美日菲等三边,以及美英澳三边(AUKUS)与日本的机制化合作等。日本还与北约及欧洲盟国深化“印太战略”合作,为欧洲大国“战略东进”与“北约印太化”提供支点。^②同时,日本将贸易、科技、供应链、基础设施等经济议题全面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构建以“自主可控”和“联盟强化”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通过立法、产业政策与国际合作构建“经济安防体系”,构筑“战略不可或缺性”以保障国际竞争力,并加强对外经济渗透。日本的海洋战略、文化及外宣战略亦日益体现出“安全主导”的特色,在强化战略资源投入、确保能力建设的同时,力图加强对国际制度性权力的争夺。在全战略领域安全化的方针下,日本试图为国家战略转型持续注入动力,并以制度化、效率化方式,将产业、科技、金融、外交、文化等各方面资源融合转化为国际政治地位与战略行为能力。

第三,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直接、密切,且日趋体现竞争性。战后日本兼顾亚洲大国、全球级别经济体、美国在亚太重要盟国及中国主要邻国等多重身份,这决定了日本对外战略影响的多维度、广领域性,包括对中国及中日关系影响的直接性与密切性。^③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积极发展,既有邦交正常化的“蜜月效应”,也很大程度基于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基础。但冷战结束后,国际权力转移及亚太地缘环境变化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战略认知及心态。特别是 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

① 卢昊、杨伯江:《大国博弈下的日本战略安全态势及其对华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32—47 页。

② 同上。

③ 杨伯江:《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年发展轨迹及对未来的智慧启迪》,《国际论坛》2022 年第 4 期,第 4—6 页。

二后，中国的崛起，加之自身的不利处境，对日本心理上的刺激及其引发的负面情绪是强烈且多层次的。而日本“政治大国化”战略由构想到实操，再到路径、手段的拓展，日本战略安全态势中对华制衡、竞争一面显著强化。日本战略转型以安全化为核心，而政治安全领域恰恰是中日关系最薄弱、最敏感的领域。^①同时，日本“政治大国化”战略行动以保守政治势力摆脱“战后体制”、重塑“民族自豪”为思想及情感底色，具有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倾向，这也势必加剧中日历史及现实矛盾。因此，冷战后至今日本战略转型纵深发展，与中日矛盾加深特别是安全困境加剧的进程高度同步。而且，在大国博弈强化背景下，中日矛盾已从围绕现实安全热点的利益与主张分歧，进一步深入到地区秩序的观念对立层次。在战略定位上，日本日趋强调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及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性”。这也直接加剧了中日矛盾的结构性和长期性与复杂性。

就战略文化而言，日本对于外部体系特别是权力变化非常敏感。在日本的自我战略定位过程中，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事实上的首要考量，且日益明确地聚焦在中美日三边战略框架中。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彼时中美关系改善及合作加强的直接驱动；当前中日关系中的诸多现实矛盾，亦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及日本的配合行动直接挂钩。自2017年以来中美博弈升级至今，日本始终关注中美关系的动态变化及其国际、地区性影响，如何在中美之间进行有利于己的“选位”已成为日本国际战略的实质主线。而且，随着中美博弈的常态化与深入化，日本正从规避中美冲突风险，逐步转向主动介入中美冲突，从中谋求所谓“前沿红利”。^②总体上，日本对中美日“三角”采取动态调节原则，谋求在中美间兼顾平衡，在依托美西方权力及价值体系的同时借重中国发展红利。这也充分反映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上。但是，在美国遏华战略基调及日本对华负面心态同步趋强的情况下，日本对华的两面性中，相比协调合作一面，制衡竞争一面的增长更加迅速且显著。日本国家战略转型行动并非全盘针对中国，但中国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体系中确实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日本在战略上“锁定中国”的特征愈发明显，抓住“机会窗口”、千方百计确保对华制衡有效性的态度凸显。日本积极统合

^① 杨伯江：《中日关系50年发展演变与未来走势——兼论日本战略因素及其规定性作用》，《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第19—31页。

^② 卢昊、杨伯江：《大国博弈下的日本战略安全态势及其对华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年第3期，第32—47页。

同盟“体制内发展”与自主防卫力量建设，聚焦重要战略领域安全化转型，推动“印太”地缘战略，其外溢效应正直接而明显地反映在中日关系上。除了美国的战略牵引调动，日本自身地缘区位的特殊性、持续处于高位的战略活跃度及明确的对华制衡意图，导致日本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强且总体趋向负面。

三、日本战略研究与《日本学刊》

基于学科发展规律及现实应用需求，区域国别研究正突破单一国别区域、单一学科或单一问题领域的局限，呼唤长周期、广视域、深层次、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并要求以战略性的思维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基本规律与根本动力，超越纷繁复杂的各类表象动态，而深入影响对象国走势与中外关系发展的底层逻辑上。^① 区域国别学建设特别是其实践属性与现实需求，呼唤针对国别的综合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而正处于战略活跃期且对中国战略影响直接密切的日本，无疑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作为新兴交叉学科，日本战略研究领域涵盖广泛，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外交运筹、军事防务、区域合作、科技创新等多个维度以及相关学科方法范式的统合交叉运用。它充满发展潜力，同时也蕴含难题挑战。不可否认，在研究领域议题、理论方法、概念界定等层次，日本研究体系下的战略研究还迫切需要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需要对日本国家战略行为的底层逻辑及深层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挖掘、更明晰的阐述，从而确保持续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日本战略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在推进新型区域国别学建设，特别是加强跨学科融创、深化战略性研究方面，学术期刊的价值进一步被放大。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有助于引导基础与应用研究深入发展，推动学科研究超越局部性，形成整体发力，产出更具战略全局性价值的成果。在这方面，迎来创刊 40 周年的《日本学刊》在中国日本研究界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日本学刊》承载了几代学人的智慧结晶，它以综合性和学术性为出发点，不仅扮演中国学界观察日本国情及中日关系的窗口，也始终推动着中国日本研究的视角、方法及范式创新。随着中国学术

① 张素、陈梦莉：《〈日本文论〉创刊 6 年 推动长周期广视域深层次跨学科研究》，人民网，2024 年 9 月 13 日，<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4/0913/c35421-40319484.html> [2025-05-01]。

体系的完善与研究视野的拓展,《日本学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对日本经验引介层面,转向更加多元、立体、平衡的日本研究。《日本学刊》始终关注战略性重大问题,鼓励跨学科综合研究。近年来,学刊刊载了一批关于日本国家战略、战略思想文化、外交战略、安全战略、文化战略、海洋战略等议题的学术论文,获得了广泛的正面评价,并反映在学刊综合排名及被关注引用度的提升上。不仅如此,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战略研究、社会文化批判乃至数字人文技术等多元方法在刊物中交融共生,塑造了新的研究气象。注重现实问题研究的《日本学刊》还与关注历史文化等基础研究的《日本文论》形成“双子效应”,进一步响应了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潮流趋势,为中国日本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日本学刊》的发展折射出中国日本研究从萌芽到繁荣且还在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日本学刊》致力于与作者建立平等、友善、互助的关系,而且积极引导他们聚焦前沿,深入问题本质,在持续的切磋打磨中提高研究成果质量。作为学刊作者之一,我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匪浅,也深怀感谢。毫无疑问,站在40周年的新起点,《日本学刊》将继续通过深化理论创新、拓展研究方法、培育学术新人等路径,不断提升中国日本研究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乃至国际影响力。这份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学术期刊,有理由也有能力成为新时期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战略研究的重要平台。